

陈家华 张 力 任 远 / 编

改革开放与人口发展

GAIGE KAIFANG YU RENKOU FAZHAN

——多视角的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家华 张 力 任 远 / 编

改革开放与人口发展

GAIGE KAIFANG YU RENKOU FAZHAN

——多视角的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开放与人口发展——多视角的研究 / 陈家华、张力、任远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309-06393-6

I. 改… II. ①陈…②张…③任… III. 人口-发展-中国-文集 IV. C924.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6004 号

改革开放与人口发展——多视角的研究

陈家华 张 力 任 远 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马晓俊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 × 960 1/16
印	张	23
字	数	464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6393 - 6 / C · 117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彭希哲教授

人口发展影响到经济、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一直是国家发展政策和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研究领域。改革开放更为人口研究带来许多新的课题。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作为改革开放后全国高校最早成立的人口研究所之一,在其30年的建所历程中一直重视人口科学前沿问题的研究。在前辈师长的引导下,在国内外学界同仁的支持下,所内全体教师共同努力,对推动中国人口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本论文集是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自1979年成立以来研究成果的一个汇集。由于篇幅的限制,论文集只能选取所内(包括现职和已离任)同仁部分公开发表过的代表作。这些论文发表在不同年份,涵盖了人口研究的多个领域,研究方法百花齐放,理论和实证并重,结论也反映了百家争鸣的特点。所收集的论文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外的权威学术期刊,在学术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也对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过有意义的参考。虽然某些观点现在来看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重温这些论文,有助于读者追溯不同时期人口研究的热点,了解人口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的多元性,以及人口问题与时俱进的复杂性。我们将与国内外同行一起,继续推动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

目 录

对世界性通货膨胀问题的一些看法	桂世祚/ 1
研究人口理论 控制人口增长	吴斐丹/ 9
从西方家庭的危机说开去	
——婚姻、家庭与人口	张戎舟/ 18
中日人口年龄构成转变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比较分析	潘纪一等/ 25
1985 年与 1984 年上海市区流动人口的比较分析	郑桂珍等/ 34
中国古代的人口质量管理思想	吴申元/ 40
人口微观仿真方法及其应用	俞 斌/ 45
略论我国人口质量问题	李 斌/ 51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	彭希哲/ 58
中国人口区划的定量尝试	陆康强/ 97
关于中国城市化政策之我见	张志鸿/104
人口老年化与计划生育	陈先淮/110
上海市居民户集体户与旅馆、招待所接纳流入人口比较分析	张运藩/119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口控制	朱国宏/125
中国国际移民探微	朱国宏/132
国有工业与其他经济类型工业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谢为安/144
为转变生育观念创造良好的社区环境	张 真/152
社区发展与生育行为的线性结构模型	任 远/160

论企业改革进程中的职工安置	陈家华/169
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戴星翼/175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及其变化	王桂新/183
上海市贫困人口就医问题及对策研究	梁鸿等/198
有关区域合理人口规模定量研究方法的讨论	陈家华等/211
对流动人口就业中男女平等的思考	陈月新/221
市场化条件下的妇女就业及其劳动权益保护	
——对上海非公有制企业女工的调查	王菊芬等/227
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口迁移特征分析	魏星等/239
论区域人口风险管理与控制体系的建立	彭希哲等/254
“逐步沉淀”与“居留决定居留”	
——上海市外来人口居留模式分析	任远/266
Living and Working at the Margin: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Cities	张力/275
China: Policy and Practice of MCH Since the Early 1990s	郭有德/295
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	王桂新/315
Conceptualizing China's urbanization under reforms	张力/328

对世界性通货膨胀问题的一些看法^①

桂世祚

作者简介:桂世祚(1917—2008),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士,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教授。曾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大同大学、东吴法学院,先后任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副教务长,上海财经学院统计系教授、统计系副主任,1983年起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人口研究室主任,1984—1987年任人口研究所所长。

一、几种不同的定义

在经济文献中,就我所知,Inflation 有几种不同的定义。三四十年以前,经济学家常常对 Inflation 下这样的定义,即它是货币数量的增加,而这种增加引起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或过度上涨。Inflation 一词的汉译是通货膨胀,按照字义来说,即通货数量的增加,看来同上述定义是完全符合的。然而,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倾向于用另一种定义,即它只是一般价格水平的过度上涨。从传统的定义转变到新的定义看来是有理由的,因为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以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而不是以货币数量的增加来衡量的。当然,这些经济学家依然充分地承认货币供给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的决定性因素。第三个定义是哈伯勒教授以前在他所著的《繁荣与萧条》一书中提到的。按照他的看法,它只是货币数量的增加,而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不作任何考虑。由于这一定义不为一般所同意,我在此将只简短地提一下。还有另一种可以想到的可能的定义,即它是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而这种上涨是由于货币数量的过度增加所引起的。这一定义和传统的定义很相像,只是提法颠倒一下。我不准备采用这个定义,因为要指出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货币数量的增加,是有困难的。

因此,在英语中现在所用的 Inflation 一词和它的汉译之间,看来存在着某种不

① 该文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一致性。我们在讨论中必须注意到这种不一致性,这样才能确知大家是在讲同一件事情。

通货膨胀率一般是用价格指数的变动率来代表的。由于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影响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力而导致人民之间实际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因此用价格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率是合乎逻辑的。在这方面,消费者价格指数比其他任何价格指数都合用,因为它更广泛地包括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

二、战前和战后的通货膨胀

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更确切地是 1950 年,标志着两个类型的通货膨胀的分界线。在 1950 年以前,通货膨胀一般局限于为战争或革命所冲击的个别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例如 1921—1923 年德国的通货膨胀和 1945—1949 年我们所经历的中国的通货膨胀。这一类型的通货膨胀常常被称为极度通货膨胀或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它的破坏性是如此之大,使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达到天文数字,所有正常经济关系完全遭到破坏。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所有其他国家的价格水平则趋向于缓慢下降,几乎看不到通货膨胀。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特别是战后 1950 年以后,大多数国家中价格持续上涨,到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更达到了高峰。这一次的通货膨胀不限于个别国家,而是世界性的。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战后的通货膨胀还在另一个方面不同于战前的通货膨胀,它像是一种慢性病,虽然它从未发展到可同 1950 年以前的极度通货膨胀相比拟的那种严重状态,但许多国家的人民现在已把通货膨胀视为他们所面临的头号经济问题,而制止这种慢性的通货膨胀已成为许多国家政治议事日程上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了。

三、统计分析的方法论

在以下各节中,为了对这种世界性通货膨胀作某些统计分析,我大量引用了《国际金融统计 1980 年年鉴》所发表的统计资料。在附表中,我分别列出了 1950 年以后 30 年中和三个十年中通货膨胀率的平均数、最高数和最低数。1980 年的数字没有包括在内,因为它们仍然是初步的和不完全的。在计算平均通货膨胀率时,我用了中位数而不用算术平均数或几何平均数,因为算术平均数过分受极端数值的影响,而增长率的几何平均数只决定于最早和最后两项数值。最高和最低通货膨胀以及它们之间的全距表明在某一时期中通货膨胀率是否稳定。对于相同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最高和最低通货膨胀率之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全距。对所

有这些数字进行比较,可以使我们了解战后年代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情况(见表1)。

表1 全世界和各类国家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率(%)

		1951—1979	1951—1960	1961—1970	1971—1979
全世界	最高	15.3	9.6	6.0	15.3
	平均	4.5	3.4	4.4	11.1
	最低	1.0	1.0	2.6	5.8
工业发达国家	最高	13.3	9.9	5.6	13.3
	平均	3.5	2.0	3.0	8.3
	最低	0.5	0.5	1.8	4.7
发展中国家	最高	18.6	5.6	7.0	18.9
1. 石油输出国	平均	4.2	2.3	1.5	10.9
	最低	0.1	1.3	0.1	4.2
2. 非石油输出发展中国家	最高	29.3	15.1	19.1	29.3
	平均	11.4	8.4	11.5	24.8
	最低	2.6	2.6	7.2	10.3
(1) 亚洲	最高	27.4	8.7	11.5	27.4
	平均	5.4	4.2	4.6	8.0
	最低	-1.0	-1.2	1.9	-1.0
(2) 非洲	最高	19.8	9.3	6.8	19.8
	平均	4.8	2.3	4.5	15.6
	最低	1.0	1.0	1.6	5.1
(3) 欧洲	最高	33.0	6.1	21.8	33.0
	平均	6.8	4.8	6.8	18.4
	最低	-3.1	-3.1	4.3	10.9
(4) 西半球	最高	55.3	36.4	36.3	55.3
	平均	22.0	14.6	21.2	40.6
	最低	5.5	5.5	11.9	16.0
(5) 中东	最高	30.3	12.4	9.6	30.3
	平均	4.9	1.5	2.8	20.8
	最低	-0.5	-0.5	0.4	0.6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统计1980年年鉴》第58—61页。

四、整个世界和各类国家的通货膨胀

在上表中,就整个世界来说,1970年以前两个十年中的通货膨胀率应当被认为是温和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分别为3.4%和4.4%。在70年代中,通货膨胀比以前要剧烈得多,平均通货膨胀率为11.1%,而1974年则高达15.3%。在各种不同类别的国家中,可以看到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工业发达国家在70年代中的平均

通货膨胀率为 8.3%。而以前两个十年则为 2.0% 和 3.0%。石油输出国家在 70 年代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 10.9%, 而以前两个十年则为 2.3% 和 1.5%; 与此同时, 非石油输出的发展中国家在 70 年代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 24.8%, 而以前两个十年则为 8.4% 和 11.5%。值得注意的是, 石油输出国家 60 年代的平均通货膨胀率甚至低于 50 年代。在 70 年代中, 石油输出国家的平均通货膨胀率虽上升到 10.9%, 仍大大低于非石油输出的发展中国家的 24.8%。就所有时期来说, 非石油输出的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和最低通货膨胀率的全距, 既大于工业发达国家, 也大于石油输出国家。从地理区域来说, 70 年代中非石油输出的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程度, 按平均通货膨胀率的高低, 其次序排列如下: 西半球 31.5%, 中东 19.5%, 欧洲 17.2%, 非洲 15.5%, 亚洲 8.0%。同一时期中的同一些国家, 通货膨胀率的离散程度, 按全距的大小, 其次序排列如下: 西半球 39.3%, 亚洲 28.4%, 中东 24.3%, 欧洲 22.1%, 非洲 14.7%。西半球的发展中国家, 在以前两个十年中早已有很高的平均通货膨胀率, 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分别为 14.6% 和 21.2%。在整个 30 年时期中, 这一类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的全距高达 49.8%, 大大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的同一类国家。

五、工业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 20 个工业发达国家事实上包括了资本主义世界所有主要工业发达国家, 其大多数通货膨胀率在缓慢上升。例如, 美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从 1.4 上升到 2.2%, 日本从 3.2% 上升到 5.4%, 西德从 1.9% 上升到 2.6%, 英国从 3.0% 上升到 4.0%, 意大利从 2.3% 上升到 4.0%。有同样情况的其他国家还有加拿大、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等。引人注意的是, 冰岛在 60 年代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已为 12.0%, 在 1969 年更达到 22.4% 的高纪录。然而, 在同样两个时期中, 包括法国、瑞典、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少数国家的平均通货膨胀率, 似乎有下降的趋势。在 70 年代中, 几乎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大大超过以前。在这 20 个国家中, 最高通货膨胀率达两位数的有 17 个国家, 平均通货膨胀率达两位数的有 7 个国家。在这一时期中, 按照以平均通货膨胀率所表明的通货膨胀程度, 名列最前面的国家为冰岛 32.2%, 西班牙 15.6%, 意大利 14.7%, 英国 13.4%, 爱尔兰 13.2%, 新西兰 11.9%, 芬兰 11.0%。对这些国家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作进一步的观察, 可以揭示出更多的对分析有用的资料。在 70 年代中, 冰岛的通货膨胀率达两位数字的有 9 年, 意大利和西班牙有 7 年, 爱尔兰和新西兰有 6 年, 英国和芬兰有 5 年。1974 年和 1975 年都有 14 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从 1976 年至 1979 年, 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的国家每年有 5 个到 9 个。值得注意的是, 西德、瑞士、奥地利和瑞典的通货膨胀率在 70 年代从未达到两位数,

而其中前三个国家则 30 年来一贯如此。

还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平均通货膨胀率较高时,通常其最高和最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全距也较大。例如,在 70 年代,冰岛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 32.2%,全距为 42.6%,均名列工业发达国家中的第一位。这一点看来是颇为自然的,因为通货膨胀本身就是经济不稳定的一种症状。然而,完全可能找到不同于这个一般规则的例子。例如,70 年代日本和加拿大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均为 8% 左右,但日本通货膨胀率的全距比加拿大要大得多。

六、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

工业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问题是大家所熟知的,为了讨论当代的这个重大问题,已写出了许多专著。遗憾得很,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问题,虽然其剧烈程度绝不比工业发达国家低,却没有受到同样的重视。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通货膨胀率也应当被认为是温和的,虽然其中有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是在逐渐上升,例如亚洲的菲律宾,非洲的加纳,欧洲的葡萄牙和南斯拉夫。在西半球,有少数几个国家已开始出现非常高的通货膨胀率。在这两个十年中,阿根廷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 20% 和 22.4%,巴西为 29.6% 和 36.8%,智利在 60 年代为 27.3%,50 年代如果有数字的话,可能也只略低一些。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阿根廷的最高纪录是 1959 年的 100%,巴西是 1964 年的 91.6%。在 70 年代,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越来越高。在我所研究的 20 个国家中,最高通货膨胀率达到或超过两位数的有 19 个国家,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或超过两位数的有 11 个国家。最令人吃惊的是,少数几个国家事实上已创下了三位数的高纪录。在西半球,阿根廷 70 年代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 159.5%,而最高通货膨胀率为 1976 年的 443.2%;智利同一时期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 91.9,而最高通货膨胀则为 1974 年的 506.0%。在非洲,加纳这一时期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 29.9%,而最高通货膨胀率为 1977 年的 116.4%。从 1975 年以来,包括 1980 年在内,阿根廷已连续 6 年有三位数的高通货膨胀率。如果不是近年来那里的通货膨胀形势稍微有点慢下来的话,很可能发展到战前那种极度通货膨胀。在这些国家中,极高的通货膨胀率必然同时有很大的最高和最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全距。例如,在 70 年代,智利的全距为 486.6%,而阿根廷为 419.9%。非石油输出的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理应受到全世界经济学家更认真的重视。

至于石油输出国家,人们通常认为,由于它们因输出石油而有大量的收入,经济情况应当好一些。石油的输出当然对这些国家好处很大,它们在 50 年代,特别是 60 年代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比较低,即可证明这一点。例如,伊朗和伊拉克 60 年代的平均通货膨胀率都比 50 年代低。在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1970 年以前的

平均通货膨胀率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到了70年代,石油输出国家也受到世界性通货膨胀压力的影响。在所研究的9个石油输出国家中,70年代的最高通货膨胀率全部达到两位数,其中有四个国家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两位数。完全可以这样说,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石油输出国家也不能摆脱世界性通货膨胀的浪潮。然而,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程度不像非石油输出的发展中国家那样剧烈,甚至比工业发达国家也稍稍轻微一些。

七、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

有个时候,有些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日益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同样可能现于非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中。例如,在像南斯拉夫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战后年代的通货膨胀是如此明显。从50年代到60年代,通货膨胀程度不断加剧,平均通货膨胀率从4.6%上升到9.4%。这两个十年中的最高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955年的11.0%和1965年的33.0%。在70年代中,平均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升到两位数16.1%,最高通货膨胀率为1975年的23.5%。从1971年直至1980年,南斯拉夫的通货膨胀率已连续十年达到两位数。尽管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取得许多成就,通货膨胀却一直是那里的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中,我们也曾观察到,在某些时期,一般价格水平有所上涨,例如,在60年代初期,还有在最近几年中。以1980年来说,根据国家公布的数字,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全年平均比1979年上升6%。一般价格水平的这种上涨应当说是不算大的,因为主要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基本上保持不变。人民对人民币的信心是如此坚定的,以致银行私人存款不断创造新的纪录。然而,如果一般价格水平超过2%、3%或4%就应当认为是通货膨胀的话,那么,在我国也有通货膨胀,虽然这种通货膨胀是相当温和的,而且将可望只延续不太长时间。不过,对此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食品类价格上升达10.5%。

八、世界性通货膨胀的产生

为了解释通货膨胀是怎样产生的,在经济文献中曾提出许多理论体系。本文的目的不是去深入讨论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内容。如果个别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决定于它的需求和供给,那么,一般价格水平必然决定于总需求和总供给。因此,通货膨胀是可称之为需求拉力和成本推力两种经济力量结合作用的结果。在所有影响总需求的因素中,货币数量的增加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而在供

给方面,某些原料价格的提高在许多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应当被认为起着关键的作用。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责怪那些努力为其出口商品取得较好价格的国家,因为这些原料的价格有时确实低于它们应有的价格,把它们提高到可以认为是合理的较高价格,也是正当的。

然而,我在上面所表明的看法还不足以解释当代通货膨胀的世界性。这里,我必须指出与此有关的两个问题。首先,所有现代国家都倾向于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直接地或间接地为了这个或那个目的,在不同程度上采取某些可以引起通货膨胀的措施来弥补政府赤字,因为这是他们随手可用的最简单方法。其次,特别在西方世界中,所有现代国家在贸易和金融关系方面是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致通货膨胀可以很容易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其他国家。当两个国家的货币汇率是固定时,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趋向于引起另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当两个国家的货币汇率是浮动并可以随时调整时,竞争性贬值可以在两个国家中都引起通货膨胀。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提高其货币的价值,这相对地降低了对方国家的货币的价值,从而趋向于在那个国家中引起通货膨胀。然而那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又转而对货币增值的国家施加通货膨胀的压力。欧洲货币市场和类似的货币市场的存在使这种经济过程变得更加可能实现。这样,世界性通货膨胀就十分容易出现了。在此意义上,通货膨胀不仅是一种慢性病,而且是一种传染性的流行病,甚至是全世界的流行病。

由于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通货膨胀政策的经济后果,这些国家在 80 年代非常可能继续按 70 年代的同样办法行事。近年来有些经济学家设计了缓和通货膨胀的新建议,但付诸实施至少要有几年的讨论和试验。关键性原料如石油的供给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大可能得到改善。鉴于所有这些因素,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形势在 80 年代不会有多大改善,至少在 1985 年以前是这样。

九、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利条件

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未找到,也不可能找到医治通货膨胀的灵丹妙药。应当指出,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会患通货膨胀病,但由于它们的经济制度的本质,而使它们具有某些有利条件。首先,就国际贸易金融关系使通货膨胀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来说,这一点对社会主义国家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因为这些国家的价格通常特别在短期内并不同国际市场的价格直接相联系。在我国,由于目前进出口额在工农业产值中只占有很小的比重,这种影响更为微小。其次,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宏观经济方面和微观经济方面进行计划安排,这样,在通货膨胀产生以前,既可以预防通货膨胀,而在通货膨胀真的出现以后,又可以

作必要的调整来缓和以至消除通货膨胀,使不致影响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常常由于急于建成社会主义,使经济建设投资过多和投资比例不完全恰当,因而造成财政赤字,引起通货膨胀,这种情况经过调整是完全可以改变过来的。经过调整以后,情况将再一次回到正常状态,整个经济也必将获得比以前更快更健康的发展。我国自己的经验过去证明是这样,今后必将证明仍是这样。这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决策者只要十分慎重地作出决策,就可以减少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在这方面,还必须着重指出,统计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根据充分的可靠的统计资料,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研究人口理论 控制人口增长^①

吴斐丹

作者简介:吴斐丹(1907—1982),教授。1930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毕业,1933年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演习经济理论。历任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兼主任、政治大学教授兼经济学院院长。1978年任人口研究室主任,上海人口学会会长,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顾问,是我国现代人口学的倡导人之一。

—

人口问题似乎是到近代才产生的,人口理论研究似乎也到近代才受到人们的注意。实际上,人口问题从古以来就为人们所关心,并且是国家施政中的重要部分。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夏尔,就曾在其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财富的生产,不过是扶养人类,满足他们的欲望,发展他们的身体、智能、德性活动的手段。”接着又说:“关于人口增殖的研究,往往被说成是近代的事。但是概括形式的研究,在世界的一切时代,都曾引起思虑深湛的人们注意。”^②确是如此,我们可以从中外古代以来的思想家的著作,来说明人口问题理论的发展。

从我国历史来看,早在二千几百年前,就有孔孟的主张增殖人口、重视人口品质的思想;有荀卿的“兼人”(招徕移民)之说:“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③差不多同时也有墨翟的“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注意人口繁殖的观点,并且分析情况,提出增殖人口的政策^④。另外方面,也有韩非不同意孔孟,墨翟增殖人口的观点,认为人口过多,财

① 该文摘自复旦大学经济系人口理论研究室编:《人口问题与理论》,复旦大学1983年版。

② A·马夏尔:《经济学原理》(第六章“人口的增殖”)第173页。

③ 《荀子》议兵篇。

④ 《墨子》辞过篇。

富不足,生活困难,是社会不安的根源,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妇女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①。这两种不同的关于人口问题的思想,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

我国的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分布极为不均,所以很早就有均民之说。如宋代叶适,他认为人口众多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但还须使人口在地域上能够平均分布。人口过度密集的地方,有地狭人稠,生活困难的弊害;而地广人稀的地方,也只是狐兔虎狼成群,不适于人才的锻炼培养,因此主张把过度集中地方的人口,移居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去,实行移民辟田,垦荒实边,可以增加税收,巩固边防^②。

我国古代不仅有人口问题的论述,而且还有人口政策和人口统计方面的丰富资料。如《周礼》中关于男婚女嫁,保息安民,就是在安定中增殖养民方面的规定^③。杜佑的《通典》中,有《户口人丁论》,从历代的人口资料得出结论,认为沉重的租税负担,阻碍人口的增长,因而主张降低赋税,以免人口因逃税而减少^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户口考》中,研究了历来的人口调查,法国比奥特对此有很高评价,并称其为“政治统计之父”^⑤。马端临指出:由于重赋苛役,使户口调查得不到确实数字。并且认为人口的品质比数量更为重要,人品不好,虽多无益。到近代则有洪亮吉(1746—1808年),他通过分析中国历代人口资料指出,由于租税使人民不敢实报人丁,使历代人口统计失去真实性。他比马尔萨斯更早地提出:如果没有任何阻碍,户口的增加一定快于生活资料^⑥。近百年来,我国讨论人口问题的著作就更加多了。

在西欧,情况也是如此。古希腊的立法家,认为人民是民族最重要的元素,主张采取奖励人口的立法。但大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不主张人口的无限度增加,希望维持一定数量下的静止状态。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说:“最完善最美丽的国家,就是能够维持人口数目使之不超过一定限度的国家。”并认为居民少,难以自给自足;而人口过多,又难于维持秩序。所以“城市国家人口的最适当的限度,是包括最大数目而能自给自足,而且不因此而难以管理。”因此“子女数目永远应当限制。”^⑦

在以后的西欧历史上,虽然两种思想都存在,但一般说,因为天灾人祸,人口

① 《韩非子》五蠹篇。

② 叶适:《水心别集》卷二,民事篇。

③ 《周礼》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的规定。

④ 杜佑:《通典》中户口人丁篇认为经济发展则国富民安。

⑤ 比奥特,《关于中国人口及其变动的研究》。

⑥ 洪亮吉:《洪北江遗书》。

⑦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四章。

死亡率较高,执政者总是对人口减少感到悲观,以种种方法增加人口。但另一方面受宗教的禁欲主义和哲学上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因而颂扬独身生活,甚至有人说:“宁可人类灭亡,也非过独身生活不可。”与这种思想相对抗,又有反对禁欲主义的思想,主张打破自私主义,鼓励结婚,并对多育者予以津贴。在中世纪虽然宗教的势力很大,有人在维护贞操的号召下,劝人实行宗教的独身,认为合乎道德的独身优于结婚,是尽善尽美的最高生活;但同时也有人认为人口一定要增加,人口最多的国家最繁荣,甚至攻击亚里士多德的人口可以维持在一定数目上的论点。

到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经济上产生了重商主义思想,由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主要靠剥削劳动者,扩大生产需要有较多的劳动;扩大市场,掠夺殖民地,需要增多军队,于是采取了过去所没有的积极地奖励人口政策,鼓励结婚生育,从轻处理通奸,收容私生婴儿,歧视不婚独身,限制向外移民,结果使人口迅速增加。工业革命后,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对于劳动者的需要却随之减少,使失业者人数很快增多,发生了城市贫民问题,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这样就产生了要求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各种思潮。正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失业和贫困的原因并非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而是由于生活资料的生产缓慢,而人口的增长很快所造成。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失业和贫困,是资本家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劳动成果的必然结果,并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人口问题所出现的新情况,掌握人口发展的规律,为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

二

我们研究理论的目的,在于发现支配事物发展的规律。而规律是客观事物实际情况的反映,是各种现象的相互联系。因此我们要研究理论、掌握规律,首先要对客观事物本身作详细的调查分析。所以研究人口理论的第一步,是对人口现象进行调查统计。

关于人口的调查统计工作,我国很早就已注意,上面已经提到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对历来的人口调查进行整理,而被外国人称为“政治统计之父”。他已指出由于重税与劳役,使人少报丁口,致使户口数字不确实。同时因为古代调查户口的目的,在于征收租税和安排徭役,调查的只是16岁以上至60岁的男子数;对女子和16岁以下及60岁以上的男子,都不查报;对于边区人民,则只计户数,不核计人口数,所以人口总数和实际的人口数相差很远。